

要提高社会调查的科学性

钟元俊

读了《社会学研究》1986年第一期刊出的沈冰于同志的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价值观的变化》(以下简称《变化》)一文以后,很受启发。但我觉得作为一篇社会学的调查报告,它所使用的调查方法不够严密。在此提出以下意见,与《变化》一文作者讨论。

问卷调查是社会学常用的定量调查方法之一。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,人们对问卷调查总结了一套科学程序和基本原则。根据这些程序和原则,《变化》一文在调查方法上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。

1. 问卷内容逻辑结构欠合理 问卷内容是研究者根据某项调查的对象、范围、目的、性质、任务、方法等要素来确定的。在问卷设计上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:在每个范畴(问题)上,划分的指标应该相互排斥而又穷尽,在理论上尽可能做到无懈可击。《变化》一文在这点上做得不够。

例一,表七“婚姻情况”,问卷内容的指标是:“包办”、“自由恋爱”、“上述两者之间”、“无对象”。前三项反映的是婚姻的结合途径和特点,第四项“无对象”反映的是婚姻状况。从逻辑上看,自由恋爱是相对于包办婚姻而言,无对象相对于有对象,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。显然,在这个问题的划分上,作者用了两个标准,排出的子项(指标)未能相互排斥。按常规,该项应一分为二,先划出已婚和未婚,再在已婚者中划分“包办”、“自由恋爱”等。

例二,表十二“时间观念与办事态度”中的“对时间的看法”列有以下几项指标:“不够用”、“有富余”、“无所谓”、“没回答”。前两项反映了被调查者支配时间的实际情况,是一个事实问题;“无所谓”则是被调查者对时间的价值判断,是一个态度问题。这里也存在着上述同样问题。由于问卷内容及分析推论的偏差,由此导致了《变化》一文的另一个不足之处。

2. 结论与资料结合欠严密 调查报告的分析和结论是建立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,结论与资料二者必须有紧密的逻辑联系,立论才可靠和有说服力。上述已提到,《变化》一文对农民“时间观念的变化”依据表十二的资料。时间观念意指对时间的价值判断,而表十二中的时间“不够用”、“有富余”和时间观念本身并无逻辑联系,不能从时间支配的实际状况直接推论出时间观念的变化。当然,时间“不够用”、“有富余”的时间支配情况也蕴含着某些观念的东西。《变化》一文作者未能把时间观念下降为具体变量来说明其变化,推论和资料未能衔接起来,结论脱离了资料。

例二,“婚姻态度的变化”。态度也是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评价和行为倾向,属于一种心理状态或观念范畴。《变化》一文在此引用的资料是表七“婚姻情况”,资料本身只反映了农民的婚姻事实,如“包办”、“自由恋爱”、“无对象”,作者也是从社区特点和经济等方面来说明这些变化,未涉及婚姻态度,同样,作者也未定出婚姻态度变化的变量是什么,这样,

资料及作者本身的分析都脱离了“婚姻态度的变化”的论题，显得有点不对题。

在例一、例二中，除上述不足外，共同存在的另一问题是，“变化”总是通过比较才显现的，但《变化》一文未注意收集横向、纵向的资料，如非农民工、上代人，变化缺乏数字资料说明，流于一般，因而说服力不强。

3. 分类欠妥当 问卷提出的问题要简单明了，对一些概念要界定和操作化，避免过分抽象，以免造成问卷结果的偏差或读者误解。《变化》一文在此存在以下不足：

例一，表十六“对青年人的看法”中有“思想开拓”、“思想解放”两项指标，被调查者要区分这两个概念来选择是很困难的，因为这两项指标是相容的。

例二，表十四“意愿选择”，其中“生活愉快”、“家庭幸福”、“幸福晚年”等指标在外延上是交叉的，没有相互排斥，概念变得模糊，这在态度量表中的一大忌，因为由此得出的资料往往失真。

例三，“（5）生活方式的变化”。理论界对生活方式有多种理解，作者应界定自己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进行调查和分析的。如此可以使读者了解作者说的生活方式是什么，也可以使得以后的研究者有可能验证和比较。

概念不清在问卷设计和使用过程中是难于避免的，甚至是经常的，但在资料整理，尤其是成为调查报告后，这类错误应基本避免。

4. 统计欠合理，推论容易产生偏差 问卷调查中，样本多少，抽样方法，问卷设计等是影响资料精确度的主要因素。《变化》一文由于在问卷设计上存在着上述问题，影响了其资料的精确性。

例如，表十四“意愿选择”，有项指标“找到好对象”，从情理、伦理观念和实际情况来看，该项的填答者一般已排出已婚者（包括订婚者）实际只限于无对象者。这样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：在《变化》一文的样本中，碧溪镇、欧桥村无对象者分别有5人或12人，就是说，该项的实际样本数是5和12，选择该项的各有2人或6人，比例分别是20%或50%，但在统计时，却把它扩大到全体样本，所占的百分比降到4或14，资料失去客观性。

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，主要是问卷设计未作分类，统计不合理。人们的愿望因年龄、性别、职业、经济地位而异，例如，“找到好对象”主要是未婚者考虑，“幸福晚年”、“子女孝顺”则主要是老年人和做父母的考虑。由于《变化》一文样本构成复杂，仅年龄跨度就分别从19—64，16—59，作者又未作任何分类，指标也未能相互排斥，统计分析时就很容易出现差错。

评价一篇报告，最先注意和最重要的是要看作者用的研究方法。如果研究方法精密科学，即使获得结果不够理想，该研究仍有价值，因为研究方法本身可供他人参考。反之，如方法粗糙，缺乏科学性，即使获得大堆资料，仍无学术价值。因为由此获得的资料以及由此引出的分析、结论都缺乏客观性。总之，科学研究必须具备客观性和可证性，科学方法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。国外类似的社会学研究报告尤其是高级论文、博士论文，必须包括研究方法和步骤，作者要对研究对象、抽样方式、问卷设计、分发方式、发出和回收份数、废卷数量、调查过程等均详加说明，以便读者充分了解或便于重复验证。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笔者愿同《变化》一文作者共同努力，为提高调查报告的精确性尽一份力量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社会学系

责任编辑：立立